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古版年画珍本

「北京卷」 主 编 / 王海霞
本卷主编 / 刘莹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北京卷〕

主 编 / 王海霞
本卷主编 / 刘 莹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总 策 划 / 王开元

陈高潮

总 顾 问 / 薄松年

主 编 / 王海霞

责任编辑 / 严 浩

文字编辑 / 黄小路

整体设计 / 《中国古版年画珍本》项目组

技术编辑 / 李国新

作品拍摄 / 吴 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版年画珍本. 北京卷 / 王海霞主编; 刘莹分卷主编.

—武汉 :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394-7544-8

I. ①中…

II. ①王… ②刘…

III. ①年画—作品集—北京市—近现代

IV. ①J2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7975号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

电话: (027)87679520 87679521 87679522

邮政编码: 430070

网址: www.hbapress.com.cn

电子邮箱: hbapress@vip.sina.com

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本: 635mm×965mm 1/8

印张: 45.5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本卷定价: 700.00元

全套定价: 7800.00元

凡 例

一、本书为《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北京卷》，收录了北京地区的年画代表作品。

二、本书选择年画作品时，以“古版”“珍本”为原则，不但注重作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更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书中收录了明清至民国的年画原作，主要源自王树村先生的个人珍藏，并适当增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美术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机构的藏品。

三、本书内容上分为总序、总论、综述、图版、后记五个部分。总论由丛书主编撰写，综述由分卷主编撰写，其目的是帮助读者从整体上了解中国年画艺术，形成对北京年画的基本认识。图版部分则包括作品的高清图片、基本信息、内容说明三个小板块，对每一幅作品进行全面而细致的介绍，以便读者欣赏，同时加深对年画艺术的了解。

四、为体现北京地区年画的特点，图版部分的作品共分为四大类：门神门画、神像纸马、戏曲杂画、上元灯画。其中，门神门画、神像纸马、上元灯画侧重于作品的功能，戏曲杂画侧重于作品的题材并包括其他杂类。故事、戏曲类作品大致以事情发生的时代先后为序。此外，上元灯画作品又按故事、戏曲、景物归类排序。

五、图版部分中，对作品的基本信息的标注顺序为：作品名称，版刻（或绘制）时代，体裁，制作方式，尺寸，作品收藏者或提供者。如：莲花湖，清代，贡笺，手绘，纵55厘米、横98厘米，中国美术馆藏。制作方式中，原作为绢质的，均已标明；其余未标明载体的，均为纸本。

六、图版部分中，作品的内容说明力求简单明晰，涉及年画的艺术风格、用途等方面。故事、戏曲类年画，还写明其出处。内容相同的年画，前面已有介绍的，后面的内容介绍从略。

总序

王文章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历经八年艰苦、细致的搜集、甄别、编纂工作，《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即将正式出版。此时此刻，让我回想起2006年6月初，正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迎来第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的前夕，我接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著名民间美术学者王树村先生抱病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先生谈到他看到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进展既高兴又焦虑的心情。他指出，“申遗”热潮中，书市上有多种年画出版物系新翻刻，却号称“珍藏本”或“即将消失的民艺”等，冒充文化遗产。他说：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莫如由我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策划、出版一套《中国古版年画宝鉴》，集中将我院图书馆所收藏的年画及我等私人藏品，编印出来，以此作为样板来对照、辨别真假年画，使假李逵让位，让真正的文化遗产面世。”他提出争取尽快编纂出版丛书，还附了一份编纂方案给我，说他愿为此事贡献余生。王树村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年画的收藏和研究，其收藏之丰富，在全国无出其右者；其研究之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肯定。一位八旬老人，重病在身，治疗已使他的身体很是衰弱，但他念兹在兹的仍是以实际的努力，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读了他的信和编纂方案，我十分感动。

此后，在先生的指导下，由他的学生、著名民间美术理论家王海霞研究员具体承担起这一工作。王树村先生于2009年仙逝，但这套丛书的编纂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在经费和工作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王海霞研究员带领编纂人员心无旁骛，埋头工作。至2009年底，丛书中年画的搜集、甄别、整理和图片的拍摄工作完成了大半；2010年，这套年画丛书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申报立项，成为北京市重点图书选题；2011年，该项目又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和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联合申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2012年，又成功列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并更名为《中国古版年画珍本》，丰富内容，重新编纂，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和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出版单位组织了精干的编辑力量，为出好丛书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套丛书的正式出版，不仅是中国年画出版工作的大事，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我想，以此也可告慰王树村先生在天之灵了。

这套《中国古版年画珍本》丛书，专家学者们通过对所选作品反复比对，精心遴选，收录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相关文化机构和民间年画研究家、收藏家王树村先生等多位国内外著名年画藏家的3000余幅作品。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倾其丰富的收藏提供了选编基础。十分可贵的是

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了珍藏几十年的5000余张古版年画，编纂者从中选取了500张，收录到这套丛书中。该丛书收录的许多珍贵的年画作品都是首次出版。

古版印制的木版年画和明清、民国时期手绘年画的珍贵原作，是这套丛书的主体内容。全书首先突出体现的就是“珍本”的理念，选择的作品都是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原作珍品，同时，全书还突出要求编纂的艺术规范。丛书的每卷本都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综述，各分卷主编对每一幅作品也都做了详尽的标注和图说，以期让读者对作品的内容、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以及审美价值有准确的解读，从而对中国传统年画有正确而全面的认知。可以说，该丛书不仅是传统年画真正遗产的整体性呈现，也将作为传统年画的“标准件”，为年画艺术的鉴定、恢复和新创作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开展以来，全国已有二十余个传统年画产地的年画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可见国家对于被称为“中国社会民间生活的图像志”的传统年画遗产的高度重视。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埋没民间的老画雕版重新被挖掘出来，一些收藏在民间的古版年画和近代早期年画原作也被陆续发现。如近几年发现的数百件山东高密扑灰年画，不少是高密年画历史盛期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在丛书编纂过程中，还发掘出2000余张北京、天津、河北各地的神像和纸马，印制精美，色彩鲜艳。这些传统年画原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并体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难得而又珍贵。

这套丛书的编纂队伍，有年逾八十的著名学者，也有三十来岁的年轻学子，像著名学者薄松年、张红渊等诸位先生，都以权威研究者的深厚造诣，对丛书的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参加丛书编纂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事民间美术和民间年画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他们不辞辛苦，奔赴全国各地实地采访、搜集、甄别、拍摄，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至于那些新发掘、发现的作品，则邀请了国内著名学者逐件鉴定，对其中难以判定的内容，则以实为实，不加枉论，坚持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学风来客观地呈现这些祖先留下的年画珍本。

我相信，这套《中国古版年画珍本》一定会惠及当代并传诸后世，真正为中国传统年画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发挥有益的作用。

中国社会民间生活的图像志

王海霞

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美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木版年画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绘画形式之一，有着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清代末年，木版年画遍及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重要的年画产地达到二十多个，全国每年生产的年画达到数亿张。年画的题材极为丰富，内容无所不包，被专家们誉为形象地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可以说木版年画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入社会、最生活化的影响巨大的艺术门类。年画还是非常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世界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近百年来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和研究中国传统年画和古老刻版。现在，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纵深发展，年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受到了高度重视。这套丛书，正是在这一大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这套年画珍本集，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时日，今天得以出版，不仅是民间美术领域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实现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我国著名民间美术研究家、收藏家王树村先生生前的愿望。这期间的经历，每每想起，记忆犹新，先生为年画在内的民间美术挖掘、研究而奋斗的一生，让后人感念。

九年前，王树村先生面对在“申遗”热浪中，年画、剪纸、艺匠技法等出版的空前繁闹局面，发现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他怀着忧虑的心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06年6月，他以83岁高龄在写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的信中说道：“……书市上也有许多年画书出现，遗憾的是皆貌似抢救文化遗产，但都是些并非值得抢救的内容，因这些书多是‘抢购’年画摊上的新翻刻者，或美其名曰‘珍藏本’，或冠以‘即将消失的’……，混淆了‘申遗’的真相。虑及出版之物，艺术水平及是否属于‘遗产’问题，则令人生疑。据我所知，传统的早期木版年画，多半毁于‘文革’。中国艺术研究院及我个人早年收藏的年画，是真正的原作，可谓遗产。但有些年画书籍或丛书的编委多是不精通民间艺术者。倘若所编之年画品类，多半是市上所售之伪劣货色，则对‘申遗’无疑造成不好的影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莫如由我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策划、出版一套《中国古版年画宝鉴》，集中将我院图书馆收藏的年画

及我等私人藏品，编印出来，以此作为样板来对照、辨别真假年画，使假李逵让位，让真正的文化遗产面世。我院所藏的资料可贵，正当面世以正视听。”

这套丛书的编纂计划写于2006年6月，由我执笔，基本上体现了王树村先生的设想，写就后呈送给王文章院长，得到了他的重视和支持。之后，王树村先生重病缠身，由于这一工作的复杂性，十分遗憾先生未能亲眼看到他的夙愿的实现。

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出版工作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湖北美术出版社、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决定联袂出版这套中国古版年画的鸿篇巨制，实是为后人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它的出版，不仅为中国美术史年画研究提供了最为详实的图像资料，也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套极为珍贵的图文资料，这也是对王树村先生最好的纪念。

这套丛书采取了分卷编制的方式，按产地分类，共有十一卷：北京卷，天津卷，山东卷(上)，山东卷(下)，山西卷，河北卷，河南卷，陕西卷，江苏、浙江、上海卷，四川、重庆卷，综合卷。

这套丛书所收录的年画作品时限为：上起年画肇始时期的宋金时期，下迄20世纪50年代。年画图版皆标注名称、时代、体裁、制作方式、尺寸等。每幅图版都有解说文字。内容方面，坚持“珍本”的概念，所收录的年画作品皆为各地传统古版年画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以及具有教育意义、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的作品。此外，每卷开卷都有专家撰写的综述文章。

王树村先生生前非常重视年画中的纸马的研究，他写过多篇文章，研究这种被称为“百份”“甲马”的民间神像，因为它最直接和形象地反映了黎民百姓的宗教信仰，传达了其心理深层的文化诉求。在这套丛书中，我们特地遴选了各地的纸马中有典型性的作品，其中不少是以前没有发表过，没有受到重视

的作品，其价值不言而喻。

在文稿的撰写中，我们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1. 从文化史和艺术发展史视角，按照年画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审视和描述，力争全面勾勒出年画独有的文化面貌。

2. 注重年画不同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对其背后的民俗文化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成就和历史背景等，作出客观的交代。

3. 每卷本按年画不同题材分类，各分卷的介绍凸显本卷地域文化特点。对相同题材的作品，从造型艺术的丰富性出发，分而述之，关注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4. 年画作者多为民间艺人，画面所题文字难免存在衍夺窜讹的问题，为便于阅读和查考，均以规范的文字呈现。图版的内容说明，因地域、风俗及传承差异，为尊重民间艺术生态的多样性，对涉及的人名、故事等不作硬性统一。

年画是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间美术的最大一宗。它是我国传统绘画之山水、花鸟等画种日益兴盛，人物画逐渐衰落之际新兴起来的一个画种，借助年俗文化而发展，又借助雕版印刷术的广泛运用而普及到城乡各地，其表现内容无所不包，渗透到世俗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过去，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最为重要的两个事项就是听戏和赏画，所赏之画主要是每年更换一次的年画。年画和戏里好看好听的故事，牵动着人们的心，所谓“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说的就是民间年画的魅力。画里有说不尽的千秋事，有道不完的人间情。它是百姓学习知识的教科书，也是人们了解世事的窗口。年画的价值，正在于它不是宫廷少数统治者的艺术和文人雅士的个人情感的抒发，它表达的是社会最为广大的民众集体的信仰、观念和情感，而这正是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的形象的资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

但是，长期以来，年画艺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与其创作者和主要使用者的低下地位有着密切关系。早在年画艺术形成的宋代，标榜“轩冕才能、岩穴上士”的文人画家与出身卑微的画院众工、民间艺人之间就地位悬殊，对立分明。因而皇族出身的郭若虚在其画论《图画见闻志》中称：“凡画

必周气韵，方号世珍。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郭若虚还将画家按朝代分为上中下三等。宋代的三等分别是：上等，王公、士大夫；中等，高尚其事，以画自娱者；下等，业于绘事，靠作画为生的画师艺匠。另一位宋代画论家邓椿，在其所著《画继》中将绘画艺术按尊贵程度排列了次序，由高到低分别是：圣艺、侯王贵戚、轩冕才贤、缙绅韦布、道人衲子、世胄妇女。民间艺匠如同附录一般，置于世胄妇女之后，这实际上还是推崇统治者和士大夫画家，贬低工技画师。我国绘画史上士大夫和以卖画为生的民间画师地位高下之分，由此可见。

此后，历代有关画史的论著中，民间画工始终处于遭贬的境地。不仅如此，在明代，画家（即便是名家）作画，如果“入时人之眼”，为民间年画作坊刻印出版而广为流传，也会遭到文人评论家的藐视。明代翰林院孔目、绘画评论家何良俊便公然贬斥蒋三松、张平山等名家“最入时人之眼”的作品，称“此等虽用以揩抹，犹惧辱吾之几榻也”。

回顾年画艺术的发展历程，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年画艺术虽为封建文人所不齿，却赢得千百万城乡民众的钟爱，以至绵延千余载而不衰，反而渗透到城乡各个角落，成为广大人民点缀岁时节令的必备品？以描绘往昔事实、英雄楷模、世俗生活为主的年画艺术在民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是由于它在功能方面上承古代“指鉴贤愚、发明治乱”之图画要旨，在技艺方面则下传六法和线描人物画之技艺，既继承和光大了传统的民族绘画，又形成了适合自身生存的艺术特色。正因为如此，当元明之际传统人物画衰落中断后，北宋以来宫廷“院画”的工笔重彩人物画传统还能在年画尤其是天津杨柳青年画中得到完整的保留。

我国古代的绘画大多以人物画为主。最早的品画名著《古画品录》的作者、南朝萧齐时人谢赫在论及绘画的功能时指出：“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古代绘画是形象地载录历代兴替和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这种载录的目的，在于“明劝戒”“兴教化”。其要旨已为民间年画所吸收，其题材也为年画所继承，并依据时代的特点予以补

充、拓展。年画始终扎根于城乡的平民大众之中，努力从世俗民风中挖掘丰富的素材，以表现民众的喜怒哀乐，讴歌传统美德，揭露社会弊端……使广大民众于年画艺术的欣赏中获得美而有益的感受，从而喜爱年画，自觉地接受其传统民族文化内涵的熏陶。

因此，从年画艺术在绘画要旨、技法两方面对民族绘画传统的传承来看，称年画艺术为我国民族绘画传统之正宗，并不过分。

年画的题材，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它追述“往昔事实”，褒贬历史人物，向人民灌输了爱国主义、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它描绘了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也展示了社会动乱状态下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它细腻地刻画了岁时节庆、婚丧嫁娶等平凡而又精彩热烈的世俗生活，为终年操劳的平民百姓享受短暂的年节欢乐增添了光彩；它寓教于画，将几千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内容，浓缩到一幅幅构思巧妙的图画之中，成为贫苦的樵子农夫启蒙教育的百科全书。“消寒图”“耕织图”等形式的历画，成为向农民群众提供有关农事节气、生产操作知识的科普读物和工具书；“二十四孝”年画又在倡导孝道的同时，传播了“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传统孝亲文化……

年画艺术形象直观、通俗易懂，为民众所熟悉。广大人民群众常常从中发现自己的“影子”，从而喜爱它，将它当作自己岁时节庆、世俗生活的精神食粮。年画艺术极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根植于民间大众的生活，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年画艺术在描绘现实生活的同时，不忘将历史、文学、宗教等融为一体，艺术地将它们与世俗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它杂糅儒、释、道和原始宗教、神话传说，赋予各类神祇以世俗形象，甚至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取代宗教诸神。如以唐代秦叔宝、尉迟恭等名将取代传说中的神荼、郁垒为门神，将唐代道士孙思邈尊奉为与神农、扁鹊同列的药王，等等。

年画艺术还不失诙谐幽默，富有极高的创造性。如对于民众信奉的神灵，它也进行了善意的调侃，于是有了《打灶王》《闹门神》等戏曲年画。它还幽默地为灶神改名易姓、“婚配”妻妾，乃至创建灶王府邸，增置属神；为捉鬼的猛神钟馗添了一位乘轿出嫁的窈窕小妹。

在咸丰十年（1860年）山东画坊刻绘的《释道治鬼图》里，年画艺术将现实生活中的中华民族反抗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焚烧圆明园的正义斗争，以神话方式描绘为佛祖如来和太上老君率八位弟子痛击三只花猪（寓意侵略者），起到了唤醒和鼓舞民众团结爱国、共御外侮的宣传作用。此图以抽象表现具体的浪漫主义手笔，还为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天津杨柳青、安徽芜湖、福建漳州、陕西凤翔、河北武强及上海等地刻印的反帝和革命战争题材的年画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年画艺术既富于现实特征，又饱含浪漫色彩，这二者的有机统一使年画的艺术特色更加显著，作品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当然，年画艺术的价值，远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它的起源、发展及衍变的过程，与人民的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居室格局、区域环境、审美要求、宗教信仰、民族精神、爱国思想等密切相关。因此，对年画艺术的研究，小而言之，将有益于了解中国社会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年画与文人画的区别，时局变化对年画的破坏或推动作用等，从而勾勒出年画艺术的发展概貌，填补我国美术史上的空白；大而言之，年画就是一部中国社会民间生活的图像志，也是留给后代的一部形象的史书。

目 录

001 北京年画综述

019 门神门画

059 神像纸马

151 戏曲杂画

191 上元灯画

北京年画综述

刘莹

一、概述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部，背靠燕山，最早曾是周代古燕国的都城，古称之为“燕”。辽会同元年（938年），在北京地区建立陪都，号南京幽都府（开泰元年改号析津府），亦称作燕京；金朝在贞元元年（1153年）建都于北京，称为中都；元代始，北京开始成为全中国的首都，被称作元大都；明初以南京为京师，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为加强北方边防，逐渐将北京建立为北方新的政治军事中心，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开始修建紫禁城，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开始清朝二百多年的统治。

城市的建立，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北京自辽代建都，就成为北方的雕版印刷中心。当时的统治者积极吸收汉族文化，从北宋输入大量印本书，逐渐掌握雕版印刷技术。作为陪都，北京不仅在悯忠寺、弘法寺等寺庙设有印经院，还出现不少刻版印刷佛经的私人书坊，如仰山寺前杨家、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昊天寺福慧楼下成家等。1974年，在应县木塔考古发现的一批极为珍贵的辽代文物中，大部分刻书、刻经与版印佛画都是在当时的燕京（今北京）雕印，最著名的要属木刻汉文大藏经《契丹藏》¹，卷首有精美的单色扉画佛像，另外还发现了墨印填色和漏版刷印的彩色独幅佛像（图1—图4）。这些由皇家组织、燕京雕刻的应县木塔秘藏版画代表着辽代佛教版画的最高水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不仅是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在雕版印刷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其雕印业的繁荣可与北



图1 《契丹藏》之《大法炬陀罗尼经第十三》卷首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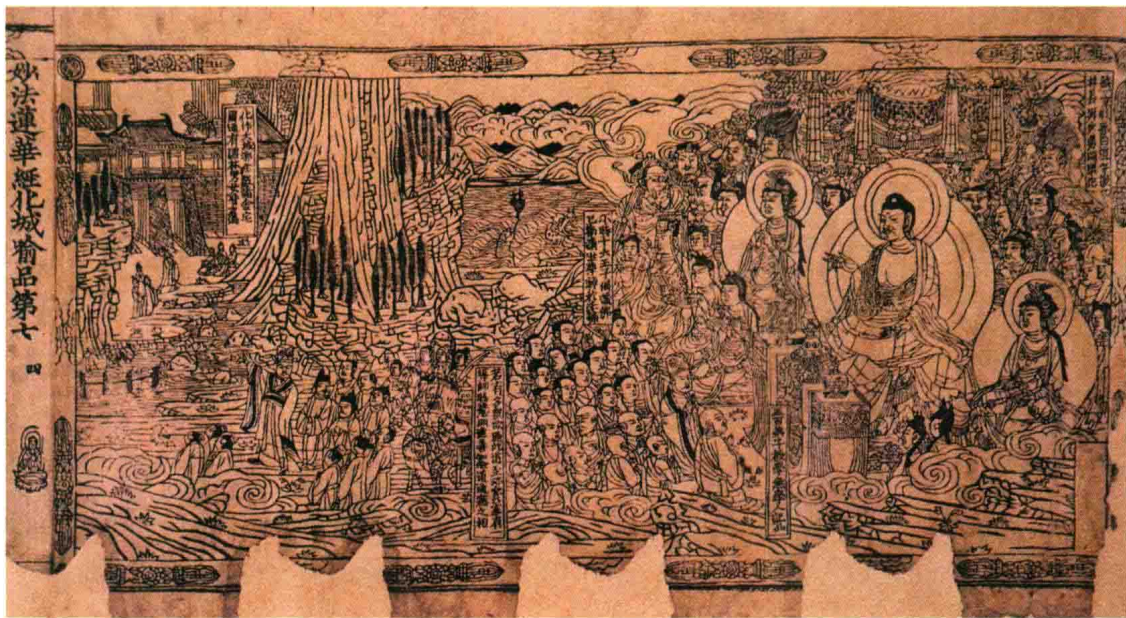


图2 辽刻《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卷首画

1. 《契丹藏》又称《辽藏》，据宋《开宝藏》翻刻，全用汉文，有用千字文顺序编排的编号。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年代上起辽圣宗统和八年（990年），下至天祚帝乾统元年（1101年），由汉族刻工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同雕，雕刻地点为燕京。见《文物》1982年第6期《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

图3(上左) 炽盛光佛降九曜星官房宿相
(墨印敷彩独幅版画)

图4(上右) 南无释迦牟尼佛(漏版套印独幅版画)



宋印刷业发达的城市相媲美。这些雕印精美的佛经版画，为北京后来的木版刻印纸马艺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金灭辽与北宋后，将开封的工匠艺人掠至北方，为后来北京民俗版画艺术的发展亦起到积极的作用。

北京的木版年画以门神、灶君、天地、财神、纸马等为主。门神大幅者高1米，小幅者约20厘米，以红、绿、蓝、黄四版套色印刷。门神形体粗短，容貌威猛，天衣飘带布匀画面，具有图案装饰韵味（图5）；门神之外，尚有福寿天官、文武状元、榴开百子图等门画，尺幅均不大。纸马为一大宗，既有城市工商业者所奉的财神、喜神、行业祖师等，又有务农之家所需的水草马明王、青苗神、四季花神等神祇，还有一些是生子（送子娘娘）、结婚（天地龙车）、寿诞（南极星君）、盖房（土科）（图6）等平时印卖者，名目众多，总计约百种，俗称“百份”。其中有不少是各行各业创始人，上首刻其像，或作道人装，或画官将模样，下方则是染布、造屋、挖煤、冶炼等劳动情景，望之便知其为某一行业之祖师，有如《天工开物》之插图（图7），反映了我国人民对古代自然科学史上有过卓越贡献者的崇敬和怀念。北京年画中尚有一种“过稿”和版印挂笺，过稿多是粗笔水墨，以生宣纸数十张裁好放齐，以酒和墨汁作画，墨汁由上往下渗透，一稿可出许多张，内容有雏鸡、瓜果、蔬菜等；挂笺五幅为一堂，上刻各式连钱图案，其上有印绘的八仙、十六应真、四大天王等图像，鲜丽悦目，工巧绝妙，是北京都城特有的一种挂笺形式。



图5 秦琼 纵25厘米 横15厘米 清代版
王树村藏

北京印门神画、刻挂笺的作坊，集中在建国门外的高碑店村。高碑店位于北京、通县（今



图6(左图) 土科 纵32厘米 横27厘米 清代版 中国艺术研究院藏

图7(右图) 三窑之神 纵34.5厘米 横31.5厘米 清代版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通州区)之间,清代为皇粮转运码头,归顺天府大兴所辖,商贾聚集,民俗浓厚。冬闲时节,当地农民多以刷印门神画、雕刻挂笺等手工艺换取生活所需,及至腊月将门神画、挂笺等送到城内打磨厂各纸店,可获得一些报酬,同时再换回“梅红料”及“南粉帘”、“夹帘”等纸张,以作来年印制之用。过去察哈尔省的张家口,热河省的兴隆、承德等地的商贩,入冬都到京城打磨厂各纸店画铺趸货满车,将北京的门神画销往长城口外各乡镇。

在以往的年画研究或相关著作中,有关北京年画的内容颇为匮乏,鲜有单独论述,究其原因,或有以下关系。其一,“卫画”盛行京城。著名年画产地天津杨柳青毗邻京城,明清时期杨柳青年画因流入宫中而名声大噪,杨柳青著名的戴连增画店还在打磨厂东口开店,后又加开“增华斋”分店,资金雄厚,曾请杨柳青年画艺人到京,创作适应京城人们喜爱的画样。杨柳青“细活”年画因其画工精致,风格华美,受京城达官贵族和城市居民喜爱,故年节时北京城内人家多采购杨柳青年画装点宅第。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十二月初十外,则卖卫画、门神、挂钱、金银箔、马子(纸马)。”此处卫画即指杨柳青年画,因杨柳青距天津卫仅十余公里之故。虽然北京郊区亦有年画作坊进行生产制作,但主要是门神画、天地神像、纸马等品类,且供应人群多为城郊或山区小户人家,而内城仍是以杨柳青年画为主流。因此,北京本地刷印的年画常被忽略,或仅以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其二,北京年画品种单一。以往仅将门神、纸马、天地神像等民俗版画归纳为北京年画,缺少像其他年画产地所包括的故事、小说、戏曲、民俗生活等主流年画题材,并且版样构图、刷印套色也较粗朴简率,这使得北京年画无论是风格还是典型性上在全国年画产地中并不突出,故而以往论著中对北京这一年画产地述之甚少。

若按照狭义的年画概念,仅是指新年时人们清扫屋舍后,粘贴在墙上的木版彩印画。而